

收入不平等、公平偏好与再分配的实验研究*

□汪良军 童波

摘要: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公平与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成本与效率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中国被试的自利偏好与公平偏好对个体再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除了自利偏好,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个体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再分配偏好中,公平偏好满足需求法则,并且与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最后,再分配行为受到决策者的角色与社会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公平偏好 再分配 实验研究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国家统计局调查研究发现,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的0.491,其后几年有所回落,可是,2012年依然高达0.474。这已经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已有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引发各类严重后果(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2005;陈春良、易君健,2009;吴一平、芮萌,2011)。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自然的推论: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人们对收入再分配的呼声也随之增加。可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再分配?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再分配偏好?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搭建宏观微观之间的联系、为宏观规律寻找微观基础提供一个较好的突破口,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依据。

人们为什么需要再分配?我们认为,基于决策偏好的视角,已有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基于经济理性偏好的自利论;二是基于社会偏好的公平分配论。自利论的观点认为,人们支持再分配是因为它对自己是有利可图的(Meltzer-Richard, 1981; Benabou and Ok, 2001)。一方面,社会上的低收入者可通过“劫富济贫”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在不确定环境下,再分配可以规避风险,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而公平分配论认为决策者具有社会偏好,人们之所以支持再分配是因为它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再分配偏好?该问题与人们在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基于人们公平感决定因素的角度,有关公平分配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结果平等的公平观;二是基于过程或机会的公平观。前者认为,人们具有不平等厌恶偏好,只要分配结果不平等,人们就有再分配需求,以此提高结果的平等性或增加决策者效用(Fehr and Schmidt, 1999)。不过,后者认为,产生特定收入结果的因素可区分为人们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可承担责任的因素(比如:努力水平、技能等等)和人们所无法直接控制的也无须担当责任的因素(运气、出生、种族等各

*本实验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225)的资金支持。感谢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经济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对本实验研究的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类身份等等)(Dworkin, 1981a, b; Roemer, 2002)。基于这两类要素进行公平判断,假如产生不平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个体可承担责任的要素,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是公平的,而由个人可控制因素造成的结果不平等就是公平的(李骏、吴晓刚,2012; Cappelen and Eicheleb et al., 2014)。除此之外,公平分配论还认为,人们对收入公平的需求还取决于获取“公平”所需付出的成本大小影响(Carpenter, 2007; Anderson and Putterman, 2006),同时,也面临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Andreoni and Miller, 2002; Engelmann and Strobel, 2004)。

学者们在上述公平分配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文献中主要研究的是初始分配问题(Cherry, Frykblom and Shogren, 2002; Cappelen, Hole, Sorensen and Tunngodden, 2007; Cappelen, Konow, Sorensen and Tunngodden, 2013; Carlsson, He, H. and Martinsson, 2013; 陈叶烽等, 2011),很少研究公平偏好对再分配决策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尽管已有一些学者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再分配决策的影响因素(Krawczyk, 2010; Roth and Wohlfart, 2016; Kuziemko et al., 2015; Hong Hao et al., 2015)。可是,目前这些有关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的实验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研究一般在给定一种决策者类型的前提下对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进行实验研究,很少会同时研究多种决策者类型的再分配决策。本文拟从多种类型决策者的公平偏好视角对再分配决策进行实验研究。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计划者、“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等不同决策者类型在面对上文所述的公平分配影响因素时的再分配决策是存在差异的。第二,这些文献中的被试基本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很少来自处于发展转型中的中国。Alesina 和 Fuchs-Schündeln(2007)的研究发现,经历过社会主义的东德人民比西德人民更偏好再分配。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1949年后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历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再分配偏好会是怎么样的呢?在Durante、Putterman 和 Joel van der(2014)、Farina等(2015)的实验框架下,本文揭示了中国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并且力图与西方国家被试的再分配偏好进行简要比较,除此之外,我们采用Kohler(2003)差异

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运用实验数据估计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效用函数。

本文其余内容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与理论假设。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分析4个方面文献:收入的获取方式、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公平与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与再分配决策;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独特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与再分配行为。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的4个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实验设计与实验内容。第四部分,按照实验的3个部分,分别进行了实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

二、相关文献与理论假设

在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将人们的行为选择抽象为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理性化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人们支持再分配的动机在于经济自利。经济自利包括现期的经济收益和预期的经济收益。从现期经济自利动机来看,在Romer(1975)静态模型的基础上,Meltzer 和 Richard(1981)提出了再分配理论范式。该理论认为,个体支持或反对再分配的决策取决于再分配政策带来的净经济收益。Corneo 和 Grüner(2002)称之为“经济人效应”。从预期经济自利动机来看,学者们研究了流动性预期与未来经济收益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Benabou 和 Ok(2001)的POUM假说对该影响做出了解释。该假说认为,预期将来收入增加将降低当期的再分配倾向,这解释了穷人也有可能不支持高税率的再分配政策。因为他们期望自己后代的经济地位上升,如果税率过高,到时自己及后代也会受到伤害。Ravallion 和 Lokshin(2000)、徐建斌(2015)的研究验证了POUM假设。Varian(1980)把风险因素引入到经济自利模型,研究发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尤其是风险规避者,再分配可以给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提供缓冲,使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保障生活。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社会调查数据,Fong(2001)研究了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程度。他们发现,经济自利动机可以部分解释人们的再分配偏好,但并不是全部。杨晓兰和周业安(2013)的实验研究显示: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呈现明显的自利动机。不过,在再分配

的实证研究中还发现:再分配偏好受到人们有关税前不平等收入公平性认知的影响。比如:Piketty (1995), Fong (2001), Alesina 和 Angeletos (2005), Krawczy (2010)认为再分配或者收入转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觉得税前收入是不公平的。

1. 收入的获取方式、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

实证研究的这些发现意味着:人们的再分配决策不仅仅受到经济自利偏好的影响,而且受到个体微观层面的公平偏好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的实验研究中,基于结果平等的公平观认为,人们具有不平等厌恶偏好(Fehr and Schmidt, 1999)。可是,在收入分配实验中,Cappelen等(2007)研究发现仅有43.5%的被试属于该类型,在再分配实验中,Hao Hong等(2015)研究发现仅有19.4%的中国被试属于该类型。基于修改后的独裁者博弈,Fershtman、Gneezy和List(2012)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被试甚至表现出对基于结果公平的厌恶。Adams(1965)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所比较的是每个人的投入产出比,而不是简单的比较结果是否相同。Dworkin(1981a, b)和Konow(1996, 2000)把产生特定结果的因素区分为人们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可承担责任的因素(比如:努力水平、技能等等)和人们所无法直接控制的也无须担当责任的因素(运气、出生、种族或各类身份等等)。假如产生不平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个体可控制且可承担责任的因素,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是公平的;相反,如果产生不平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个体无法控制且无法承担责任的因素,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一些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禀赋为个体无可控制的“意外之财”(windfall money),禀赋为个体可控制的“挣得收入”(earned money)时被试分配给接收者的份额更少(Cherry et al., 2002; Cherry and Shogren, 2008; Oxoby and Spraggon, 2008)。Carlsson、He、H.和Martinsson(2013)在实验室实验与自然现场实验两种方法下,研究发现,独裁者在禀赋为“意外之财”时捐献的都更多。在自然现场实验中,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研究发现,“白得”的初始禀赋(意外之财)能够显著提高被试捐出禀赋的比例。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Clark(2002)并没有发现禀赋为“挣得收入”对于“搭便车”者比例的显著影响。Harrison(2007)在Clark(2002)实验数据基础

上,分析发现禀赋为“意外之财”对于被试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可是,Cherry等(2005)的研究却发现“意外之财”并不影响被试的分配决策。Kroll等(2007)在异质性禀赋公共品实验中的研究结论却于Cherry等(2005)相反。Cappelen等(2014)利用血氧水平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验证了“挣得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具有脑神经基础。虽然这些研究在结论上具有不一致性,不过,总体上,上述研究表明收入的获取方式会影响被试的公平偏好与分配决策。

虽然这些文献已经从决定收入获取方式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决策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关注的是初次分配问题而不是再分配决策问题。另外,这些文献中分配决策者的角色大多数是利益相关者,研究其他类型决策者的公平分配偏好比较少,比如:社会计划者或中立旁观者,“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决策者。在为数不多的实验研究中,Cappelen、Konow、Sorensen和Tungodden(2013)与本文研究比较接近,不过,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事前”公平与“事后”公平角度研究“中立旁观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再分配偏好。本文拟从不同决策者角色的视角针对不同初次收入获取方式提出如下再分配行为决策假设。

假设1:人们的再分配行为决策与初次收入的获取方式有关。相对于由人们可控制的因素(努力或能力)所带来的“挣得收入”不平等,面对人们不可控制的因素(运气或身份)所造成的初次分配结果不平等,人们具有更强的再分配偏好。

2. 公平与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与再分配行为决策

根据Okun(1975)“漏篮”的思想实验,再分配的政策会对劳动激励产生影响,会给人们创造财富提供负向激励,影响资本形成和投资,从而造成一定的“漏出”或“效率损失”。因此,在人们的再分配动机中应该包含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收入分配实验文献中,有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已经得到大量的研究(Charness and Rabin, 2002; Engelmann and Strobel, 2004; Schildberg-Hörisch, 2010; Fehr, Naef, Schmidt, 2006)。这些研究发现,已有的分配偏好文献过度夸大了Fehr和Schmidt(1999)公平偏好理论对于被试分配决策的解释,事实上,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或效率,相当多

的被试愿意牺牲自己的收入来提高其他人的收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愿意通过牺牲公平来提高效率。不过,这些文献研究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再分配决策问题。在研究公平与效率对于再分配决策影响方面,与本文比较接近的一篇文章是 Hao Hong 等(2015)。在实验中,Hao Hong 等(2015)采用修改后的收入分配博弈,研究社会计划者在面对公平与效率之间权衡取舍时的再分配决策问题,并且基于决策数据,以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来估计被试个体的社会福利函数。他们发现,面对公平与效率之间权衡取舍时,具有社会计划者角色的被试在再分配偏好方面具有异质性,其中,除了 19.4% 的被试具有强公平偏好与 4.6% 的被试具有强效率偏好之外,大多数被试具有比较温和的效率偏好(53.7%)。不过,在实验设计方面,本文与 Hao Hong 等(2015)存在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对于再分配效率损失的处理上不同。在 Hao Hong 等(2015)文中,通过外生给定不同的“公平的价格”(两位被试把分配所得转化为收入的能力比)来体现再分配负向激励所造成的不同效率损失程度,而本文没有考虑被试之间的能力差异,为了简化,我们直接给定两个效率损失水平。第二,Hao Hong 等(2015)一文仅分析作为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偏好,而本文比较了不同角色或情景中决策者的再分配偏好。

在实施再分配政策(征收税负和转移支付)时要支付相当大的行政成本。据估计,美国的穷人每接到 1 美元的转移支付,社会将为此付出 3 美元以上(Browning and Johnson, 1984);根据霍洛维茨等人估计,美国的转移支付边际成本为 4.46 美元;英国为 7.76 美元(Horowitz, 1993)。假如我们把分配决策中的“公平”理解为一种“商品”,那么人们对于“公平”的偏好是否会满足需求法则呢?也就是说,再分配的成本提高是否会降低人们对于再分配动机中的“公平”需求?在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实验中,Carpenter(2007)研究了惩罚行为的需求价格弹性。实验研究发现:随着惩罚成本的上升,被试对“搭便车”者所实施的惩罚水平开始下降;当被试需要付出 4 个实验币才能减少“搭便车”者 1 个实验币时,被试几乎放弃了为实现公平而实施的惩罚行为。这意味着,当购买“公平”的价格提高时,人们将降低对于“公平”的需求。在 Anderson 和 Putter-

man(2006)实验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虽然这些文献验证了获得公平需要付出成本,可是,它们研究的都不是“公平”价格对于再分配决策的影响。在 Hao Hong 等(2015)实验中涉及再分配中的“公平的价格”,不过,这个“公平的价格”体现的是效率损失维度的成本,而不是实施再分配过程中的成本,比如,政府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而本文在实验中通过外生给定不同成本水平来体现该类再分配所引发的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 2。

假设 2: 人们的再分配偏好与再分配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负相关,并且随着再分配成本的提高而下降。

3. 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

在现有的收入分配实验研究文献中,根据决策者的分配决策是否涉及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决策者分为两种类型(Hao Hong et al, 2015): 利益无关者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被试所选择的收入分配行为不仅影响其他人的收入,同时也直接影响自己的收入,而利益无关者被试所选择的收入分配行为仅影响其他人的收入,对自己的收入没有影响。从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讲,利益相关型决策者(Fehr and Schmidt, 1999; Cappelen, Sorensen and Tungodden, 2007)的公平偏好难以避免自利偏见,它的“公正性”、“中立性”与“无偏见性”值得质疑。为了克服这种公平偏见,现有的文献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第一种方法依然是利益相关型决策者,不过,研究者把决策者置于“无知之幕”背后,人们在决定进行资源或财富分配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已或别人将会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可以诱发人们中立(impartial)的社会公平偏好。目前,已经有一些实验研究检验了“无知之幕”之后的决策者收入分配决策(Frohlich et al., 1987; 丁建锋, 2010; Schildberg-Hörisch, 2010)。第二种方法是采用利益无关型决策者,在文献中,这类决策者又被称为“中立旁观者”(Cappelen, Konow, Sorensen and Tungodden, 2013; Charness and Rabin, 2002; Engelmann and Strobel, 2004; Konow, 2009),或者社会计划者(Traub et al., 2009; Amiel, Cowell and Gaertner, 2009; Hao Hong et al, 2015)。由于人们在现实中难以观察到利益无关型社会计划者的分配选择行为,

研究者们一般采用问卷调查与实验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一般要求被试针对特定社会情景中的不同收入分配方案进行排序或者选择(Amie et al., 2009, Bosmans and Schokkaert, 2004, Faravelli, 2007)。在实验研究中,作为无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者,被试需要为其他被试选择收入分配方案(Engelmann and Strobel, 2004; Traub et al., 2005, Traub et al., 2009, 丁建峰, 2010; Hao Hong et al., 2015)。

上述有关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公平偏好研究文献研究的基本上是收入分配决策问题,很少研究再分配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实验研究中, Cappelen、Konow、Sorensen 和 Tungodden (2013), Traub 等(2009)检验了利益相关者与中立旁观者(社会计划者)在分配偏好方面的差异,丁建峰(2010)检验了中国被试作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条件下决策者的分配偏好差异。目前,很少文献在研究决策者分配偏好时比较上述3种决策者类型在分配偏好上的差异。本文尝试在该方面做出一些研究。除此之外,基于“无知之幕”之后的利益相关公平偏好研究忽视了决策者风险态度与期望收益对于收入分配决策的影响。在实验设计中,本文在模拟了“无知之幕”实验情景的同时诱发了被试的信念与风险态度,这使得我们在数据分析时可以通过剥离期望收益对于再分配决策的影响,从而可以得到更“干净”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的体现。在不平等厌恶偏好方面, Traub 等(2009)研究发现,无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者通常要比具有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者弱,前者更可能表现出随机的偏好。而 Amiel、Cowell 和 Gaertner(2009)研究发现,当德国与英国的被试把自己想象为无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者时,相对于把自己想象为具有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者,前者更具不平等厌恶倾向,可是,对于以色列的被试来说,结论却是相反的。基于这些不同决策者角色下的收入分配研究文献,我们提出本文有关不同决策者角色下的再分配行为决策假设。

假设3:决策者的不同角色(利益相关者、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在再分配行为决策中会表现出差异性。

4. 独特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与再分配行为

最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文献研究显示,独特的

社会历史与制度背景会影响被试的决策偏好。比如:Chen 和 Yang(2015)通过对经历过饥荒(1958~1961年)而幸存下来的公民进行调查发现,这种大灾难的经历影响着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Nunn 和 Wantchekon(2011)研究发现非洲奴隶贸易对于社会信任感的重要影响。在有关再分配偏好的研究方面, Alesina 和 Fuchs-Schündeln(2007)在外生性的经济制度条件下,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东西德合并后人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相对于西德人民,东德人民更加偏好于再分配。Giuliano 和 Spilimbergo(2014)研究发现,经历经济大萧条的公民表现更加期待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在一项调查实验研究中, Chen、Wang 和 Yang(2016)先向调查者凸显特定的再分配历史事件,然后要求他们进行再分配决策。他们发现,通过提供土改期(1947~1953年)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期(1953~1956年)的相关资料来凸显特定的再分配历史事件,为后辈们提供了心理框架,并影响他们的再分配偏好。而 Nunn(2012)对历史经历对于文化规范和政治信念的形成进行了一个综述性分析。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公民或被试所处社会文化制度背景、所经历特定历史事件会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偏好以及其他观念。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历程,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决策偏好会是怎么样的呢? Elaine、Meng 和 Wang(2014)采用启动技术激活儒家思想与身份,研究发现,相对于中国台湾被试,儒家文化在中国台湾与内地的不同境遇造成内地被试的行为更加偏离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内地被试比中国台湾被试更加偏爱风险、更具现状偏差与更弱的损失厌恶、更缺乏可信任性。Cameron、Erkal、Gangadharan 和 Meng(2013)有关中国“小皇帝”的行为经济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计划生育实施前的孩子,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独生子女信任别人与值得信任的水平更低、更缺乏竞争性与更规避风险。一些国内学者研究了户籍与信任水平的关系(汪汇、陈钊、陆铭, 2009)。不过,目前研究中国被试再分配偏好的文献并不多。在实验中, Durante、Putterman 和 Joel(2014)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可是,在相同实验条件下,在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

历史背景的中国被试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理论假设4。

假设4:独特社会制度(比如:户籍、计划生育政策)与历史经历会影响中国被试的再分配行为偏好。

三、实验设计

本实验所需要开展的12个实验局(session)、6个实验设置(treatment)全部在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计算机实验室进行。每个实验设置开展两个实验局,每个实验局持续时间为2个小时。每个实验局的被试由21位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本科生或MBA组成,每位被试只参加其中一个实验局,其中10个实验局以210位本科生为被试,另外2个实验局由42位MBA学员为被试,共计招收了252位被试。

在每个实验局中,当学生进入实验室时将抽取一个ID号码(1到21的数字),在21台联网的计算机中进行对号入座,然后,在计算机上输入ID号码与被试在高中期间生活的省份或地区。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之间不能进行语言沟通,在被试通过计算机屏幕阅读实验指导语时,实验员同时大声宣读实验指导语。为了保证被试完全理解实验情境,他们只有在正确回答控制性问题后才可以开始实验决策。我们告诉被试,在实验中,每位被试的收入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10元钱的出场费;第二部分取决于被试在实验中的决策结果;第三部分是在测试被试风险偏好时的收入。实验结束后,我们把每位被试的实验所得放在标有ID号码的信封中,进行现场发放,其中,被试的平均收入为48元,最高收入为216元。

本文的实验设计参考了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实验设计中3个部分的顺序是固定的,因此,他们的实验无法排除顺序效应,而本文12个实验局中有6个实验局是先进行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实验,再进行“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而另外6个实验局正相反,先进行“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实验,再进行社会计划者再分配。第二,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实验中的被试全部是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本科生,为获取

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本文实验中除了本科生外,还安排了42位MBA。第三,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实验中决定被试税前收入的4种方法分别是:随机、出生地、俄罗斯方块游戏和测试,由于很多同学玩过俄罗斯方块游戏,因此,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把该游戏改为黄金矿工游戏。

在实验中,被试要先后进行两个实验。在每个实验,被试所要做的决策都是针对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别选择一个用于再分配的税率,即,每位被试共做12个决策。每个实验局的两个实验主要区别在于被试的身份不同:在实验1中,被试的身份是社会计划者;实验2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无知之幕”背后的利益相关者而第二部分是确定税前收入的利益相关者。实验1与实验2的第一部分的共同点在于,被试做税率选择时并不知道自己由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而它们的区别在于,在实验1中被试所做的税率选择影响的是其他20位被试的税后收入,除了税收成本外,该税率并不影响被试自己的税后收入,而实验2第一部分被试的税率选择直接影响自己的税后收入。相对于实验2第一部分的被试,实验2第二部分被试是在知道自己由4种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前提下做出直接影响自己税后收入的税率选择。在实验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实验员将通过抛硬币的方法决定是实验第1还是实验2决定本次实验的收入,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决定哪种方法决定本次实验的税前收入。假如实验2被抽为决定本次实验的收入,我们规定由实验2第二部分的税率选择决定税后收入。最后,被试还将填写有关背景特征方面的问卷。

现在我们开始描述实验的具体任务。在21位学生输入ID号码与在高中期间生活的省份或地区后,计算机屏幕上显现表1。表1左列中的数字是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面板研究数据所得到的2010年中国个人平均税前收入,第一个值表示全国5%最低收入群体

表1 中国人均收入与实验收入

排名	人均收入	实验收入
20	313	0.41
19	888	1.15
18	1497	1.95
17	2098	2.73
16	2895	3.76
15	3571	4.64
14	4684	6.09
13	5360	6.97
12	6456	8.4
11	7870	10.23
10	9648	12.55
9	10033	13.05
8	11825	15.38
7	13702	17.82
6	15981	20.78
5	19314	25.12
4	21408	27.84
3	27574	35.86
2	34777	45.22
1	76899	100

的平均税前收入,最下面的值表示全国5%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前收入,依此类推。左列中每个收入除以最高收入得到右列中相应的收入。我们告诉每位被试,他们将可能获得从0.41元到100元之间的某个实验收入(表1右列),并且该收入将成为他们的税前收入。这意味着,在实验中,参与者所得到的实验收入与中国个人收入分布是相对应的。可是,谁将得到更多的收入?谁将得到相对少的收入呢?

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取决于4种因素或方法:运气、家庭或身份背景、努力工作或辛勤的付出、能力水平。前面两种方法是个体不可选择与控制的,我们把由这两种方法决定的收入称为运气收入;而后面两种决定收入的方法是个体可以控制的,我们把由这两种方法决定的收入称为挣得收入。为了模拟现实中获取收入的方法,在实验中,我们安排了4种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1)随机法,计算机将把从1到20的数字随机分配给被试,分配到数字1的被试将得到最高税前收入,依次类推。该随机分配过程是绝对随机的,它与被试的位置、登陆先后以及其他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2)“你来自什么地方”,我们根据被试登陆时所输入的在高中期间生活的省份或地区来确定“你来自什么地方”。计算机将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来确定被试所在的省份或地区的平均收入,来自最高平均收入地方的被试将获得最高的税前收入,依次类推。若出现相同平均收入,那么由计算机随机确定税前收入。(3)测试法,实验要求学生15分钟完成20道涵盖科学、文学、技术、历史、艺术等等多个领域的选择题,答对最多的被试将得到最高的税前收入,答对最少的被试将得到最少的税前收入,依次类推,并列的将由计算机随机决定。(4)黄金矿工游戏法,在计算机上,每位被试先进行两分钟的游戏以熟悉游戏,然后,进行5分钟游戏以计算被试在游戏中的得分。根据被试在游戏中得分的高低,我们将确定被试的税前收入水平。由于有些被试以前可能玩过该游戏,出于公平考虑,我们请专业人员对游戏程序与规则进行了改动。在我们解释完被试获取税前收入的4种方法后,我们向被试说明,在完成实验说明与决策后,我们将采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具体哪种方式被采用。因此,被试在做税率选择时每种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是等概率

的。从表1的税前收入分布可知,无论是采用哪种方法决定收入,被试间的税前收入分布都显得很是不平等。在实验中,我们告诉被试可以针对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选择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税,然后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因此,被试的收入会因为税率与转移分配而发生变化。在整个实验局中,除了问卷部分,我们安排了两个实验(3次税率选择)。在每次税率,被试都要针对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别选择相应的税率,在实验临近结束时,我们通过抛硬币的方法决定是实验1还是实验2决定本次实验的收入。

为了在实验中研究被试的再分配公平偏好,我们引入了两个实验变量: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Andreoni和Miller(2002,2008)在独裁者博弈研究中发现:给定禀赋条件下,增加实施公平行为的成本会降低独裁者的公平分配行为。为了体现这个思想,我们在实验中安排了税收成本参数 c ,它表示每增加10%的税率,“决定者”要承担税收成本 c 元。在实验中,我们设置了3个成本参数值: $c=0$ 、 $c=1$ 、 $c=2$ 。比如:若“决定者”选择了80%的税率,在 $c=1$ 时,他要承担8元成本,而在 $c=2$ 实验条件下,他要承担的成本是16元。通过设置税收成本参数,我们希望研究“决定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是否受到实施公平行为成本的影响。另外,我们在实验中安排了两个税收的效率损失参数: $e=0$ 与 $e=25%$ 。它表示每增加10%的税率,从20位被试那里收取的总税收就会损失 e 。通过这个设计来刻画奥肯漏洞思想,以研究“决定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与效率损失之间的权衡。根据这两个参数,我们安排了6个实验设置(treatment),在实验中,每个实验设置安排了两个实验局。

被试决策选择的最简单方法是:(a)每个被试选择税前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税,这个比例从0到100%以10%为单位进行递增;(b)所收到的总税收将重新平分给每个被试(注:重新分配与参与者所交的税收多少没有关系)。例如:被试可以对通

表2 实验设置与实验局

税收成本 效率损失	$c=0$	$c=1$	$c=2$
$e=0$	$e0c0$ 实验局 8、9	$e0c1$ 实验局 1、2	$e0c2$ 实验局 5、12
$e=25%$	$e25c0$ 实验局 3、4	$e25c1$ 实验局 6、7	$e25c2$ 实验局 10、11

过测试所获得的税前收入征 0% 的税率, 对由随机决定的税前收入征 10% 或者 60% 的税率, 等等。若征收 0 税率的税就意味着维持所有被试的税前收入分布, 即一部分被试获取高收入, 而另一部分被试获取低收入; 随着税率的增加, 被试的税后收入分布就越平等, 若征收 100% 的税率, 那么所有被试的税后收入就变得完全一样了。在实验中, 我们告诉被试, 在实验局临近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随机的方法抽出一位被试的 ID, 被抽中的被试就成为本实验局的“决定者”。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成为本实验局中真正被实施的税率, 该税率影响本实验局的税后收入分布。可见, 在影响收入再分配的税率决定方面, 我们规定由随机选出的“独裁者”决定, 而不是由所有的被试进行中位数投票决定。这样设计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 中位数投票博弈需要考虑策略性因素, 而本实验的“独裁者”博弈不需要考虑策略性因素; 第二, 在实验临近结束时随机确定“决定者”, 这意味着, 每位被试成为“决定者”是等概率的, 因此, 在选择税率时, 他们都把自己看成“决定者”或“独裁者”, 而“独裁者”的税率选择恰恰反映的是他们的再分配公平偏好, 由此, 我们可以获得被试的公平偏好数据。

为了在实验中刻画“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偏好, 在实验 1 中, 我们规定“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仅影响其他 20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 而“决定者”的收入并不取决于由 4 种方法(随机法、“你来自什么地方”、黄金矿工游戏法、测试法)所决定税前收入, 也不受“决定者”自己所选择的税率调节。根据不同的实验条件, “决定者”的收入为 $x_0 - c(10 \times t)$, 其中, 在 $e=0$ 条件下, x_0 按照等概率从 (36, 37, 38) 中随机产生一个收入, 在 $e=25\%$ 条件下, x_0 按照等概率从 (27, 29, 31) 中随机产生一个收入, t 表示税率, 取值为 0、10%……100%。可见, “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对“决定者”收入的影响仅体现在税收成本上。不过, “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决定了其他 20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 $y_i = (1-t)x_i + t(1-e)\frac{1}{20}\sum_{j=1}^{20}x_j$ 。其中, $(1-t)x_i$ 表示从被试 i 的税前收入 x_i 按照税率 t 征收后留下的部分, $t(1-e)\frac{1}{20}\sum_{j=1}^{20}x_j$ 表示所征得的所有税收在 20 位参与者之间平分。在税率成本 $c=0$ 实验条件下, 由于“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仅仅影响其他 20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分布, 因此, 我们可以得

到“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在保持每个实验局中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实验设置中被试税率选择的组间比较, 可以获得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对于作为“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决策的影响。

当被试正确回答了 5 道控制性问题后, 每位被试将按照如上规定, 针对 4 种决定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别选择税率。完成实验 1 后, 电脑屏幕开始显现实验 2 第一部分的指导语。与实验 1 一样, 表 1 右列中的每个收入水平代表对应着每个被试的税前收入。每个被试针对由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选择相应的税率, 并且在每个实验局中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参数也与实验 1 保持一致。我们采用随机方法, 从 21 位参与者的 ID 中选出一位被试, 该被试成为“决定者”, 他针对由不同方法所产生的税前收入而选择的税率 t 将决定其他 20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如上文所述, 这个随机产生“决定者”的过程仅发生在实验临近结束的时候, 因此, 被试在做税率决策时可以把自已看成“决定者”, 另外, 在实验期间以及实验结束后, “决定者”的身份都不会对其他被试公布。被试也不会被告知自己是否为“决定者”。实验 2 第一部分与实验 1 之间只有一个地方不同: 如果被试在实验 2 第一部分被确定为“决定者”, 那么该被试在实验中的税后收入计算方法与其他被试一样。在实验 2 第一部分中, “决定者”的收入是表 1 中的某个数值, 该数值对应于具体方法(比如: 测试、黄金矿工游戏、随机或“你来自什么地方”)。在实验第二部分的其他 20 位被试中将随机选出一位被试, 该被试的收入从 (36, 37, 38) 或 (27, 29, 31) 中随机抽出一个数决定, 它不受“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 t 影响。其他 19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计算方法与实验第一部分一致。不过, “决定者”的税后收入为 $y_i = (1-t)x_i + t(1-e)\frac{1}{20}\sum_{j=1}^{20}x_j - c(10 \times t)$, 其中 $c(10 \times t)$ 表示“决定者”在选择税率 t 时所承担的成本。由于被试在选择税率前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排名, 他们对税前收入的排名估计会影响到他们的税率选择。因此, 在被试针对 4 种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别选择税率前, 被试首先需要填写相关的问卷, 分别估计当由“你来自什么地方”、黄金矿工游戏、测试等方法决定税前收入时, 自己在收入分布表中的排名以及对自己的排名是否很确信。

可见,被试在实验第二部分的税率选择情境恰恰拟合了“无知之幕”(John Rawls, 1971)条件下的公平正义选择情境。另外,由于在实验2第一部分,“决定者”针对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所选择的税率不仅影响自己相应方法决定下的税后收入,而且自己还要承担税率成本,因此,相对于实验1的“社会计划者”,该部分研究的是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对于处在“无知之幕”情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再分配公平偏好的影响。

在正确回答了6道控制性问题后,被试进行“无知之幕”情境下的4个不同税率选择决策。当被试完成税率选择后,他们将要求在15分钟内完成20道选择题,而程序后台将根据被试答对的题目数进行决定税前收入的排名。测试结束后,被试计算机屏幕上会显示黄金矿工游戏的游戏规则,同时启动两分钟练习与试玩游戏阶段,之后被试要在计算机上进行5分钟的游戏以决定收入的排名。在完成了测试与游戏后,由实验人员通过抛硬币的方法确定是实验1还是实验2所选择的税率决定税后收入,若硬币出现正面,则由实验1所选税率决定收入,若出现反面,则由实验2所选税率决定收入。不过,根据实验的需要,我们暂时没有宣布抛硬币的结果。这之后,计算机屏幕显示每位被试在黄金矿工游戏、测试、“你来自什么地方”、随机等4种方法下的排名。当每位被试知道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排名后,实验人员告诉被试,若抽到由实验2决定最后收入,那么根据排名他们可以决定是否修改自己的4个税率选择。若不修改,那么我们根据实验2的第一部分的税率选择计算税后收入,若修改了税率,那么我们根据修改后的税率计算税后收入。当被试提交了第三次税率后,我们将通过掷两枚骰子来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如果两枚骰子都是奇数,则采用随机方法;如果两枚骰子都是偶数,则采用“你来自什么地方”方法;如果第一枚骰子是奇数,第二枚骰子是偶数,则采用黄金矿工游戏方法;如果第一枚骰子是偶数,第二枚骰子是奇数,则采用测试方法。

在实验局临近结束时,我们还需要测量被试的风险态度、确定“决定者”、被试完成30道问卷题。为了测量被试的风险态度,我们安排了5道选择题,每道题目都包含两个选项,若被试选择选项1就可

以确保获得2元,若选择选项2就以50%的概率获得0元,50%的概率获得3.6元、4元、4.6元、5.3元、6元。为了激励被试填写真正的偏好,计算机随机抽取一道,而被试在该道题中的选择会为他带来第三部分的收入。完成风险测试后,计算机后台会随机抽取一位被试的ID号,并且该被试成为本实验局的税率“决定者”。随后,被试的计算机屏幕显示结果信息:被抽到的实验部分、随机抽到的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决定税后收入的税率、被试在实验中总收入。最后,被试需要完成30道有关被试背景特征方面的问卷,比如:性别、专业、户籍、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等。

四、数据分析

我们分3个部分进行数据分析:第一部分为被试作为“社会计划者”时的再分配和公平偏好,第二部分是“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再分配决策,第三部分是“知道自己在知道自己各种税前收入排名后,即在确定性情况下的再分配决策。对于每个部分,利用12个实验局的数据,我们进行多元回归计量检验,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其中,因变量为每个被试在实验中的税率选择数据,而自变量包括:税收成本、税收的效率损失、税前收入分配方法虚拟变量、性别虚拟变量、户籍虚拟变量、风险偏好等变量。由于在实验中被试的税率选择范围为0到100%,可是,若对选择范围不做限制,被试有可能会选择负的或大于100%的税率,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选择0与100%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左删截与右删截。

本实验的6个实验设置12个实验局中,每个实验局由3个部分组成,为了检验顺序效应的影响,其中6个实验局(1,3,5,7,9,11)先进行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实验,再进行“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而另外6个实验局(2,4,6,8,10,12)正相反,先进行“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实验,再进行社会计划者再分配。采用秩和检验,我们发现:在两种实验顺序设计中,社会计划者被试的税率选择并没有显著差异($z=-0.440$),“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择也没有显著差异($z=0.403$)。另外,为了检验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采用秩和检验,研究发现:在税率选择方面,MBA被试(实验局2和4)与本科生被

试(实验局1和3)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z=0.203$)。基于此,在后文中,我们把不同实验顺序、不同类型被试数据放在一起分析。

(一)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

作为社会计划者,他所选择的再分配税率,一方面影响的是其他被试的收入分布,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成本的存在,选择税率越高,社会计划者的收入就越低。因此,一个自利社会计划者的最优选择是0税率。可是,实验数据显示:在12个实验局中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税率均值为34.07%,其中,88%的被试选择了正税率,29%的被试选择了至少50%的税率,甚至有4.9%的被试希望再分配后的收入分布绝对平等,选择维持初始分布的被试占11.75%。实验数据清晰的显示出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行为中存在公平偏好,即使在税收成本大于0的条件下,依然有86.83%的被试选择正税率,我们的实验数据显示:在3个税收成本(0,1,2)条件下,分别有91%、86.7%与86.9%的被试选择了正税率。这说明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被试在再分配决策中受到公平偏好的影响。

那么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是否不受税收成本的影响呢?我们发现被试在有成本的情况下选择的税率显著小于无成本的情况,在税收成本为0、1与2元的实验条件下,被试选择的税率均值分别为43.07%、32.89%、26.25%。Mann-Whitney检验表明:与税收成本为0时的被试税率均值相比,在税收成本为1与2元时被试所选择的税率均值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下降了10.1%($Z=4.141$)与16.75%($Z=7.437$)。在税收成本为1与2元时,分别有2.41%与1.19%的被试选择了100%的税率,这意味着他们宁愿自己损失40元或20元也要维护社会收入分布的完全平等。平均而言,被试在存在税收成本的实验条件下愿意付出6元或10元成本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验证了Carpenter(2007)和Gneezy等人(2010)的研究结论:实施公平行为的代价会影响人们供给公平行为的水平,同时,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对于社会计划者,税收的效率损失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呢?通过比较效率损失实验设置,我们发现:在没有税收效率损失($e=0$)与存在25%的效率损失($e=25%$)两种条件下,

被试的税率选择均值分别为39.14%与29.05%。Mann-Whitney检验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Z=5.055$)。这说明被试的再分配偏好与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与Andreoni和Miller(2002)、Charness和Rabin(2002)、Hao Hong等人(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这验证了Andreoni和Miller(2002)、Charness和Rabin(2002)、杨晓兰和周业安(2013)与本文的假设2。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身份特征,如性别、种族、年龄等也会影响再分配行为。考虑性别因素,在社会计划者实验设置下,女性被试所选择的税率均值为36.31%,而男性被试的税率均值为31.75%。Mann-Whitney检验表明: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z=3.800$)。这表明性别对于税率选择存在影响,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偏向于平均分配。进一步分析不同税收成本以及效率损失条件下性别差异对于再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时,女性和男性的税率选择均下降,但女性平均税率比男性高。这意味着当面对效率与公平权衡时,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与公平偏好具有性别差异。考虑户籍因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被试所选择的税率均值为35.28%,而城市被试的税率均值为32.52%。Mann-Whitney检验表明:在10%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z=1.804$)。这表明户籍对于被试的税率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我们还发现被试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税率的选择也会有影响。非独生子女的平均税率选择为35.49%,独生子女的平均税率选择为32.95%,Mann-Whitney检验结果也显著($z=5.069$)。该研究结论拓展了Cameron和Erkal等人(2013)有关独生子女社会偏好的研究。这些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

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是否受到决定税前收入的因素影响呢?实验数据表明,随机法、出生地法、测试法、游戏法4种方法下,被试的平均税率选择分别是43.82%、42.59%、22.83%、27.05%,可以看到,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平均税率选择相差不大,但和测试法、游戏法具有显著差异。测试法下,被试平均税率选择比随机法下降了47.90%,游戏法下平均税率选择比随机法下降了38.27%。Wilcoxon配对检验也证明了这一差异:被

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税率选择无显著差异($z=0.753, p=0.4517$),而随机法与测试法($z=10.603, p=0.0000$),随机法与游戏法($z=8.770, p=0.0000$),出生地法与测试法($z=10.619, p=0.0000$),出生地法与游戏法($z=8.377, p=0.0000$)之间的差异显著,被试在随机和出生地法下的税率选择显著高于在测试和游戏法情况下。被试在测试法下的税率选择显著低于游戏法下的税率选择($z=-4.388, p=0.0000$)。这说明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再分配倾向,当税前收入由人们可以控制的因素决定(测试或游戏),在这种“挣得收入”不平等情景下,被试具有更高的再分配倾向。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为进一步检验税收的效率损失、税收成本、决定税前收入方法及其他因素对于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我们对社会计划者的税率决策数据进行Tobit回归,其中因变量为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择,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对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两个变量进行回归,两个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显著($p < 0.001$)。增加一单位的税收成本使选择的税率减少9.48%,而增加1%效率损失使税率减少0.456%。模型2中增加税前收入的决定方式,但关于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结果依然与模型1类似。决定税前收入方法中,游戏和测试具有负效应且均显著($p < 0.001$)。测试的负边际效应为23.6%,游戏的负边际效应为18.9%,这与我们前文的分析一致,被试在游戏法和测试法决定收入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低税率,在测试中选择的平均税率最低。这个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模型3~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一些表示被试个体特征的变量。模型3加入了性别(虚拟变量,女性取值0,男性取值1),城市(虚拟变量,来自农村取0,来自城市取1),独生子女(虚拟变量,非独生子女取0,独生子女取1),家庭当前收入情况(取值1到4,“1”表示拮据,“4”表示非常宽裕)4个变量。我们发现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对税率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在0.1%水平上显著,独生子女在1%水平上显著。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女性税率选择比男性多选6.75%,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也具有负效应,非独生子女的再分配行为中更具公平偏好。

模型4加入了收入(被试户籍所在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取对数)和风险态度(0~5,0表示风险偏好型,5表示风险厌恶型)两个变量。收入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具有负效应,负边际效应为12.1%,表明存在收入越低越倾向于平均分配。比较有意思的是:被试风险态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具有正效应,表明越厌恶风险的人越倾向于平均分配。这个研究结论说明:即使社会计划者的收入并不受税率选择的影响,但是其所进行的税率选择还是会影响到其他被试收入在结果上的公平性,而被试的风险态度会影响他们的公平偏好。这与Ferrer-i-Carbonell(2010)与周业安、左聪颖和陈叶烽(2012)有关风险厌恶与社会偏好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模型5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倾向(1~7,1表示非常自由主义,7表示非常保守)和经济学课程(被试选修过的经济学课程数目)两个变量。政治倾向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边际效应为2.84%,越保守的人再分配倾向越高。经济学课

表3 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择Tobit回归(所有方法)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税收成本	-0.0948*** (-8.14)	-0.0943*** (-8.76)	-0.0960*** (-8.91)	-0.0939*** (-8.72)	-0.0913*** (-8.48)	-0.0925*** (-8.61)
效率损失	-0.456*** (-6.12)	-0.453*** (-6.57)	-0.442*** (-6.09)	-0.450*** (-6.57)	-0.458*** (-6.63)	-0.447*** (-6.23)
游戏		-0.189*** (-7.35)	-0.189*** (-7.44)	-0.189*** (-7.37)	-0.189*** (-7.36)	-0.189*** (-7.47)
测试		-0.236*** (-9.35)	-0.236*** (-9.40)	-0.236*** (-9.36)	-0.236*** (-9.39)	-0.236*** (-9.45)
居住地		-0.0197 (-0.73)	-0.0195 (-0.73)	-0.0198 (-0.74)	-0.0197 (-0.73)	-0.0197 (-0.74)
性别			-0.0675*** (-3.90)			-0.0621*** (-3.42)
城市			-0.0272 (-1.43)			-0.0224 (-1.17)
独生子女			-0.0467*** (-2.62)			-0.0516*** (-2.87)
家庭当前收入状况			-0.0188 (-1.23)			-0.0165 (-1.06)
收入(log)				-0.121* (-2.53)		-0.101* (-1.97)
风险态度				0.0118** (2.83)		0.00860* (1.99)
政治倾向					0.0284** (2.73)	0.0246* (2.36)
经济学课程					-0.00124 (-0.49)	-0.00280 (-1.10)
常数项	0.481*** (23.15)	0.592*** (21.60)	0.712*** (13.90)	1.852*** (3.63)	0.405*** (5.56)	1.605*** (2.85)
观察数	1004	1004	1004	1004	1004	1004
未删截数	837	837	837	837	837	837
左删截数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右删截数	49	49	49	49	49	49
对数似然	-347.732	-280.560	-270.049	-274.465	-278.115	-263.409
拟R ²	0.129	0.297	0.323	0.312	0.303	0.340

注:括号内为t值,* $p < 0.05$,** $p < 0.01$,*** $p < 0.001$ 。

程选修数目具有负效应,但结果不显著。模型6的回归中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回归结果与前几个模型类似。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实验中,存在税收成本、效率损失以及税前收入取决于个人能力、被试来自收入较高地区时,被试选择的再分配倾向较低。而非独生子女、女性、厌恶风险或者保守的被试更倾向与再分配。这些结论与 Durante、Putterman 和 Joel (2014), 陈宗胜、李清彬 (2011), 潘春阳、何立新 (2012) 等人的结论一致。

(二)“无知之幕”条件下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

相对于社会计划者,在“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在不知道自己的税前收入排名情况下,针对4种方法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布,分别选择一个既影响自己也影响其他被试税后收入的再分配税率。该再分配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平偏好与社会计划者有什么不同呢?

“无知之幕”下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为32.55%,比社会计划者的34.07%低,对两部分税率选择进行 Wilcoxon 配对检验,发现两者具有显著差异 ($z=-2.383, p=0.0172$)。在成本为0、1、2元时,“无知之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分别为41.96%、30.24%、25.42%,效率损失为0和25%,平均税率选择为37.16%、27.98%。可以看到,存在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情况下,被试在“无知之幕”条件下和作为社会计划者条件下的税率选择相似,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都会降低被试的税率选择。不过,被试“无知之幕”条件下税率选择在每一种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情况下都比社会计划者低,对“无知之幕”条件下数据的 Tobit 回归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表4中模型1考虑了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和社会计划者一样,两个变量都存在显著的负效应 ($p < 0.001$),且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边际负效应都比社会计划者大。这些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3。

在“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行为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被试所选择的税率比男性高,女性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为35.45%,男性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为29.53%,但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选择平均税率都比社会计划者低。这与表4中

模型3的结果相一致。另外,农村被试所选择的税率比城市被试高。

在4种不同税前收入决定方式下,被试的税率选择也和社会计划者相似。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所选择的平均税率比测试法和游戏法中的高。Wilcoxon 两两配对检验也显示4种收入决定方式下的税率选择具有显著差异。表4中模型2对税前的收入决定方式进行了 Tobit 回归,游戏法、测试法、居住地法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被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所选择的税率比社会计划者低,而在测试法和游戏法中所选择的平均税率比社会计划者高,在4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对“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择进行 Wilcoxon 配对检验,发现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前者的税率选择显著低于后者 (随机法 $z=-2.256, P=0.0241$, 出生地法: $z=-5.149, P=0.0000$),在测试法下显著高于社会计划者 ($z=2.745,$

表4 “无知之幕”背后的利益相关者
税率选择 Tobit 回归(所有方法)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去除随机法)
税收成本	-0.0955*** (-7.74)	-0.0953*** (-8.01)	-0.103*** (-8.96)	-0.0925*** (-9.00)
效率损失	-0.00461*** (-5.88)	-0.00461*** (-6.07)	-0.00425*** (-5.63)	-0.00407*** (-6.08)
游戏		-0.155*** (-6.00)	-0.154*** (-6.01)	-0.0198 (-0.90)
测试		-0.182*** (-7.12)	-0.182*** (-7.13)	-0.0346 (-1.58)
居住地		-0.107*** (-3.57)	-0.107*** (-3.71)	
性别			-0.0643** (-3.30)	-0.0133 (-0.71)
城市			0.00179 (0.08)	-0.0195 (-1.08)
独生子女			0.00918 (0.48)	0.0202 (1.16)
家庭当前收入状况			-0.0607*** (-3.65)	-0.0527*** (-3.53)
收入			-0.283*** (-4.95)	-0.0810 (-1.62)
风险态度			0.0137** (2.96)	0.0138** (3.21)
政治倾向			0.0308* (2.08)	0.0428** (3.15)
经济学课程			0.00450 (1.56)	0.00686** (2.97)
期望排名				0.0991*** (7.68)
期望排名 ×自信水平				0.00736 (1.33)
常数项	0.461*** (21.86)	0.572*** (20.88)	3.531*** (5.57)	0.746 (1.32)
观察数	1004	1004	1004	753
未删截数	810	810	810	602
左删截数	143	143	143	124
右删截数	51	51	51	27
对数似然	-401.0702	-374.34705	-334.82675	-81.210038
拟R ²	0.106	0.166	0.254	0.733

注:括号内为t值,*p<0.05,**p<0.01,***p<0.001。

P=0.0061)。这些研究结论,一方面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1与3,另一方面说明“无知之幕”、社会计划者两种决策者角色与初次收入获取方式在被试的再分配行为决策中存在交互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和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行为上的差异呢?如上文所述,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税率并不影响自己的收入,而“无知之幕”条件下的被试所选择的税率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税后收入,因此,两种不同身份的被试再分配行为差异会不会来自自利偏好。通过比较两种身份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择,我们发现:即使两种身份被试税率选择的分布非常相似,不过,相对于社会计划者条件下,被试在“无知之幕”背后的税率选择存在明显的自利倾向(见图1)。

图1表示的是“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在各自税前收入期望排名下的税率选择分布。横坐标表示被试有关自己税前收入的期望排名,其中,取值1,表示预期自己的税前收入排名第1~2名,取值2,表示预期排名第3~5名,其他取值的预期排名依次类推,纵坐标表示不同税率水平的百分比。图中气泡的大小表示特定期望排名下选择特定税率水平的被试比例,其中,气泡越大表示被试比例越大。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税前收入的期望排名越靠前,选择低税率的被试比例就越高;相反,有关税前收入的期望排名越靠后,选择高税率的被试比例就越高。尤为明显的是,当被试预期自己税前收入排名为1~2名时,大部分选择了0税率,而预期自己排名在最后18~20名的被试,则大多选择90%、100%的高税率。这说明,相对于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行为方面,处在“无知之幕”之后且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被试存在明显的自利偏好。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本文综合考虑期望排名和自信水平,我们发现:给定期望排名靠前的被试,自信水平与所选择税率水平负相关,而给定期望排名靠后的被试,自信水平与所选择税率水平正相关。另外,在表2模型4中剔除了随机法,加入期望排名变量以及期望排名和自信水平的交互项。从结果可以看到,期望排名靠后一个等级(如从1~2名到3~5名),选择的税率增加9.91%。这些结论进一步验证了自利偏好对于再分配行为的影响。

现在,比较一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与确定性条件下所选择的税率(见图2),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择,“无知之幕”情境下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更低。

这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如果被试是自利的而且对自己的预期排名正确的话,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无知之幕”情境),为了规避风险,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应该比确定性情况下高。为了对此做出解释,通过比较被试的期望排名和真实排名数据,我们发现: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存在过度自信问题。在出生地、测试、游戏3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被试真实排名均值4.30,期望排名均值3.17, Mann-Whitney 检验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z=-11.375$),预期排名比真实排名高出了一个等级多。这与心理学文献有关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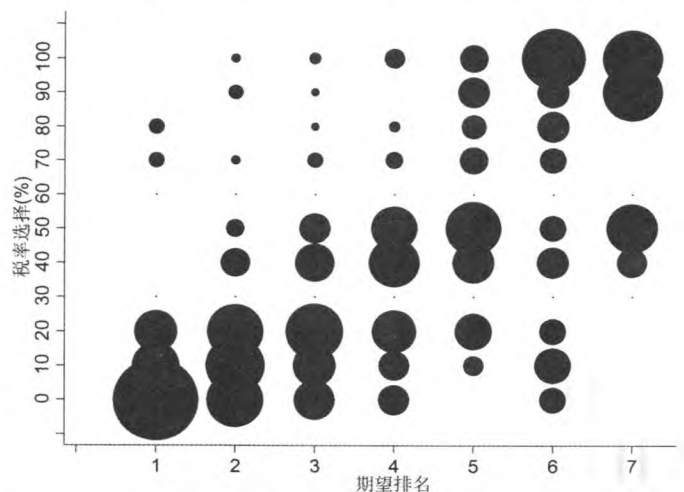


图1 税前收入期望排名与税率选择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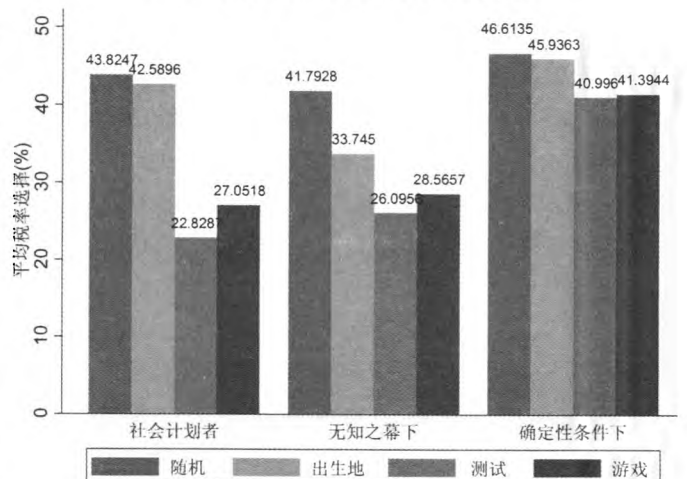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

决策时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倾向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于是,相对于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择,“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选择更低的税率就不奇怪了。因为“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总是高估自己的排名,而通过降低再分配税率是符合被试自利偏好的。

(三)在确定性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

在实验的第三部分,在选择再分配税率前,被试已经知道自己在不同决定方法下的税前收入排名,并且被试所选择的税率直接影响自己与其他被试的税后收入。在这个条件下,经济自利理性的被试应该选择一个再分配税率以使得自己的税后收入最大化,并且该税率与再分配效率损失、税前收入的决定方法没有关系。相对于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条件下的被试,确定性条件下的被试在再分配行为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偏好特征呢?是否还存在公平偏好呢?

实验数据显示,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所选择的税率显著高于实验第一与第二部分,并且和实验的前两部分一样,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对于确定性条件下被试所选择的税率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Mann-Whitney 检验结果均显著。这与被试为社会计划者、“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的再分配行为偏好是一致的。这些研究结论说明,本文的理论假设2在不同决策者角色中都是成立的。另外,在确定性条件下,有25%的被试选择0%税率,20.12%的被试选择100%税率,而在社会计划者条件下选择0%税率有11.75%,选择100%税率的有4.88%，“无知之幕”下选择0%税率有14.25%,选择100%税率的有5.08%。可见,被试在知道自己税前收入排名后选择的0%税率和100%税率人数比起第一、第二部分显著增加,表明在第三部分被试再分配行为中具有更明显的自利偏好。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3。不过,这些被试的再分配行为并不是完全自利的。如图3a所示,在确定排名后,虽然税前收入排名在前的被试比排名在后的被试选择更低的税率,但是排名在前两位的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并不是0,而是4.2%,排在最后两位的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不是100%,而是74%。这说明在税前收入排名确定

后,利益相关者的再分配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自利偏好,不过,他们所选择的税率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公平偏好。

既然在确定性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再分配行为中表现出社会偏好,那么该偏好是如何影响被试的再分配倾向的呢?我们以被试在社会计划者情境下所做的税率选择为基准,检验在第三部分社会偏好对于他们税率选择的影响。每种税前收入选择方法下,我们把在第一部分选择低于中值的被试标记为“社会计划者低税率”,在第一部分选择税率高于中值的标记为“社会计划者高税率”,再根据第三部分的正式排名和税率选择画出图3b。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一部分选择高税率的被试在第三部分依然选择高税率。这可以说明在第三部分,社会偏好依然在起作用。

为了深入分析确定性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再分配行为动机,我们运用Kohler(2003)差异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DASM模型)估计了该条件下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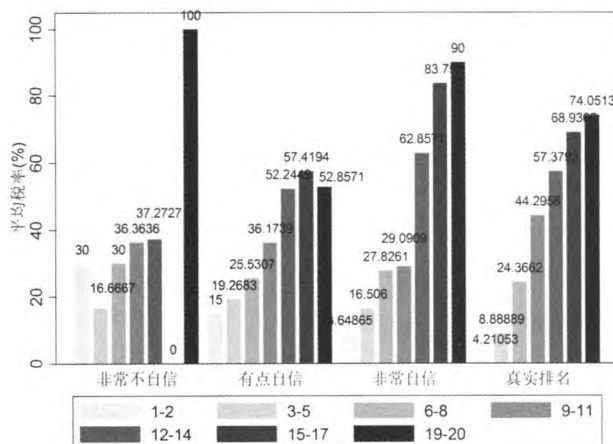


图3a 不同期望排名与自信水平的税率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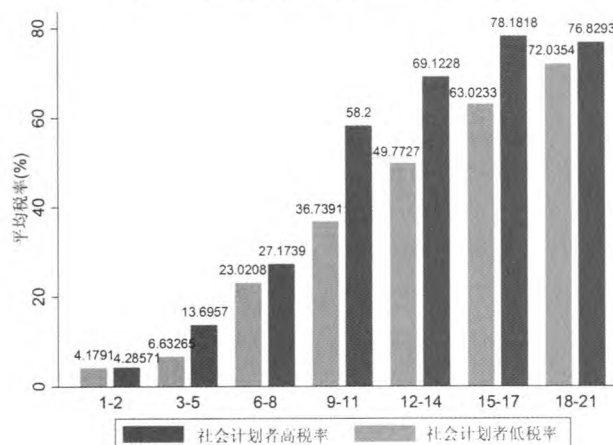


图3b 社会计划者在第三部分的选择

试的效用函数。该模型假设被试*i*的效用于来自于社会公平、个人收益与社会福利,模型如下:

$$V_i(y_1, y_2, \dots, y_n) = (1-r_i)y_i + r_i(y_1 + y_2 + \dots + y_n) - \frac{\alpha_i}{n-1} \sum_{j \neq i} \max(y_j - y_i, 0) - \frac{\beta_i}{n-1} \sum_{j \neq i} \max(y_i - y_j, 0) \quad (1)$$

该模型综合了差异厌恶模型和福利最大化模型,第一项表示*i*自己的期望收益,第二项表示社会总收入,第三项是别人比自己多的收入,即劣势不平等,第四项是自己比别人多的收入,即优势不平等。 r_i 表示参与人对社会福利的关心程度, $0 < r_i < 1$ 。 α_i, β_i 表示对差异的厌恶程度,其中 $\beta_i \leq \alpha_i, 0 \leq \beta_i \leq 1$,意味着参与者对劣势不平等更加厌恶。

为了得到被试的公平偏好,我们采用 McFadden 的条件 logit 模型,被试的效用函数采用 DASM 模型,即:

$$U_{it} = V_{it} + \epsilon_{it} = \beta_1 y_{it} + \beta_2 \sum_{i=1}^n y_{it} + \beta_3 \sum_{j \neq i} \max(y_j - y_i, 0) + \beta_4 \sum_{j \neq i} \max(y_i - y_j, 0) + \epsilon_{it} \quad (2)$$

$$t \in \{0, 0.1, \dots, 1\}$$

那么,被试选择特定税率的概率为:

$$P_{it} = P(t_i = t) = e^{u_{it}} / \sum_{k=0}^1 e^{u_{ik}} \quad (3)$$

对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税率选择进行条件 logit 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的系数表示等式(3)中的系数,即 $\beta_1, \beta_2, \beta_3, \beta_4$ 的值。第一列采用 4 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的所有数据,第二列采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两种方法下的数据,即收入由不可控因素决定的情况,第三列采用测试法和游戏法两种方法下的数据,即收入靠个人努力取得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4 个系数均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随机法—出生地法下的总收益系数除外),而且,3 列系数数值相差不大。其中被试自己期望收入的系数数值最大,总收益的系数为正,表明被试关注整体福利最大化,对

表 5 条件 logit 结果

	所有方法	随机法—出生地法	测试法—游戏法
自己期望收益	0.1154 *** (0.01059)	0.1450 *** (0.01728)	0.1350 *** (0.01683)
总收益	0.0125 *** (0.00189)	0.0076 ** (0.00267)	0.0149 *** (0.000279)
劣势不平等	-0.0103 *** (0.00079)	-0.0124 *** (0.00122)	-0.0119 *** (0.00123)
优势不平等	0.0065 *** (0.00055)	0.0055 *** (0.00091)	0.0079 *** (0.00088)
观察数	11044	5522	552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于差异厌恶,被试表现出对于劣势不平等的厌恶,但对于优势不平等则没有厌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被试在劣势中更能感受到不公平。

(四)再分配决策的进一步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决策者类型在不同效率损失与不同收入决定方法中的再分配决策,请见图 4a 与 4b,其中图 4a 反映的是不同成本条件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再分配决策,图 4b 反映的是不同效率损失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再分配决策。

我们把由随机与出生地两种方法决定的税前收入称为运气收入,而由测试与游戏决定的税前收入称为挣得收入。图 4a 显示,无论是在哪个成本条件下,也无论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入的再分配偏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策。这意味着,大量有关禀赋为“意外之财”或“挣得收入”的公平偏好实验结论在再分配实验情景中也是成立的。这与本文理论假设 1 预测的一致。通过比较不同成本水平中税率选择变化,我们可以发现,随之成本的提高公平偏好的下降率是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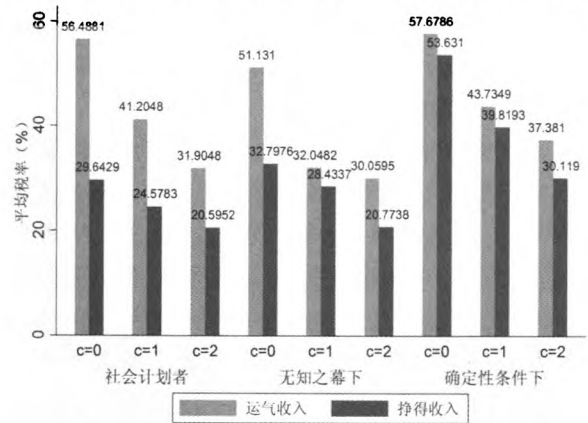


图 4a 不同成本条件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税率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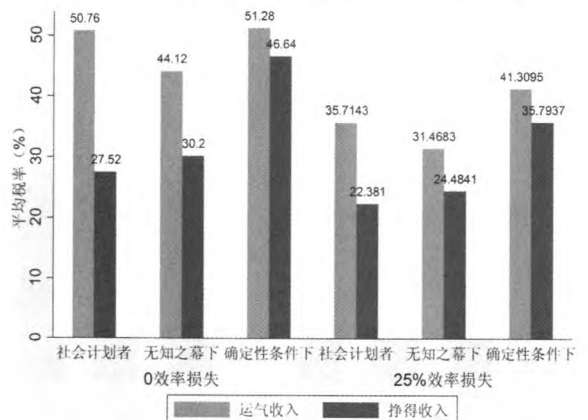


图 4b 不同效率损失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税率选择

这意味着再分配的公平需求满足标准的需求法则。虽然在对成本的设计上与 Hao Hong 等人 (2015) 不一致,但是基本结论还是一致的,并且我们研究发现,相对于运气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对于成本的敏感性要弱一些。图 4b 显示,无论是在哪个效率损失条件下,也无论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入的再分配偏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策,并且在存在效率损失时,被试的再分配偏好会下降。这个研究结论意味着,大量有关公平与效率权衡的收入分配实验研究结论在不同决策者类型以及不同的收入决定方法下也是成立的。图 4b 还显示,相对于运气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对于效率损失的敏感性要弱一些,尤其是在决策者类型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下的利益相关者。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 1949 年后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历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再分配决策会是怎么样的呢?为此,我们借助于 Durante、Putterman 和 Joel (2014)、Farina 等 (2015) 的研究,简要比较了美国、欧洲与中国被试的再分配偏好 (图 5)。

图 5 显示,在收入由运气 (随机与出生地) 决定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达到了 65.4%,这显著高于美国与欧洲的再分配偏好水平。可是,当初始收入是挣得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与美国、欧洲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略低于美国。这个研究发现说明,中国被试并不是简单的“仇富”,而是难以接受按照身份、运气等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来决定收入差距。如果把图 5 中的运气收入与挣得收入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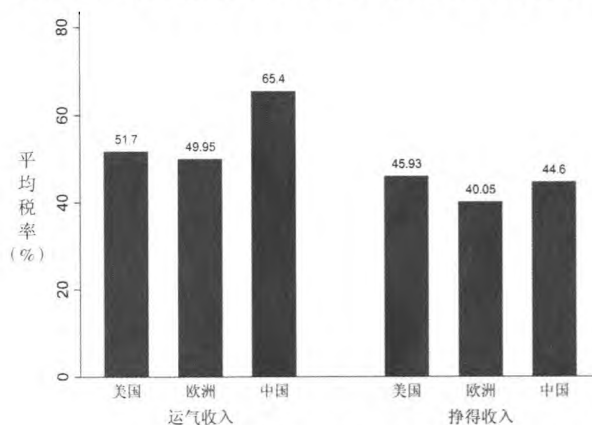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国家的再分配水平

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比美国、欧洲高。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4。对此的可能解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年轻公民的公平观是有影响的,另外,也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观点有关。

五、总结

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以 MBA 与本科生为被试,主要研究了有关中国被试再分配行为决定因素的 3 个问题:相对于经济自利因素、公平因素在中国被试再分配行为选择中是否发挥作用?再分配行为选择中的公平偏好是否受税前收入获得方式 (运气或挣得) 的影响?为获取公平而付出的成本或效率损失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再分配行为决策?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在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根据实验变量 (成本与效率损失) 的不同取值,共安排了 6 个实验局。在每局实验中,为了模拟中国现实的收入分布现状,我们以当前社会实际收入分布为实验的税前收入分布,每位被试以 3 种不同决策者角色,针对 4 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共选择 12 个再分配税率。

根据被试所选择的再分配税率数据,我们发现,经济自利因素是人们再分配偏好的重要动机。“无知之幕”情境下,期望排名靠前的被试选择税率低,期望排名靠后的被试选择税率高;确定性条件下排名在前的被试选择的税率很低,而排名靠后的被试选择的税率很高,而且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的自利水平最高。不过,自利并不是决定再分配行为的唯一因素。因为假如被试是完全经济自利的,那么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被试在存在税收成本的实验条件下就不会选择正的再分配税率,可是,实验结果显示即使存在税收成本,大部分人依然选择正的税率。另外,比较“社会计划者”部分的税率选择和确定性条件下的税率选择,发现“社会计划者”部分选择较高税率的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依然选择较高税率,这说明确定性条件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被试在再分配决策中具有公平偏好。因此,实验数据说明,除了自利因素外,扮演 3 种不同类型的决策者,被试的再分配行为都受到公平偏好的影响。通过比较实验 3 个部分的平均税率,我们发现,总体上,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再分配水平存在差异,其中,

利益相关者所选择的税率最高,其次是社会计划者,选择税率最低的是“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进一步检验被试在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我们以实验第三部分的数据为基础,采用 Kohler(2003)的 DASM 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被试,若自己处于劣势不平等时,被试的行为出现显著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倾向。在“无知之幕”实验设置中,研究结果表明:被试越风险规避,选择的税率越高。该结论说明被试的再分配行为中有自利与公平偏好,还存在风险规避的动机。

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受到税前收入获取方式的影响。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许多学者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否可控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公平的感知,即税前收入是因为不可控的“运气”,还是可控的“挣得”会影响人们的公平观(Carlsson, He, H. and Martinsson, 2013; Alesina and Angeletos, 2005)。本文实验中设置了4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其中随机法和出生地法表示不可控的“运气”或身份,而测试法和游戏法则是根据被试取得的成绩排名,相当于可控制的“能力”或者“挣得”。综合三部分的税率选择,发现被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为42.42%,而在测试法和游戏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为31.15%。这说明被试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受到税前收入获取方式的影响:若税前收入的不平等是由于人们不可控的运气造成时,那么该不平等更具不公平性,相反,若税前收入的不平等是由于人们可控因素造成的,那么该不平等更具公平性。我们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在哪个成本与效率损失条件下,也无论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入的再分配偏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策。这个研究结论与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 Carlsson, He, H. and Martinsson(2013)在自然现场实验情景中有关禀赋为白得还是挣得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该研究结论具有外部有效性。通过比较“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择,我们发现,“无知之幕”决策者具有过度自信与自利偏好,这使得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前者的税率选择显著低于后者,而在挣得收入条件下显著高于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决策的国际比较方面,我们发现,在收入由运气(随机与出生地)决定时,

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达到了65.4%,这显著高于美国与欧洲的再分配偏好水平。可是,当初始收入是挣得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与美国、欧洲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略低于美国。

在有关公平与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与再分配决策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公平需求也满足需求法则,并且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不论是在“社会计划者”情境下,还是“无知之幕”和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平均税率选择,都存在税收成本越高,平均税率越低,效率损失越大,平均税率越低的特点。通过比较不同成本水平中税率选择变化,我们发现,随之成本的提高公平偏好的下降率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再分配的公平需求满足标准的需求法则。这与 Hao Hong 等人(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不过,实验研究显示:相对于运气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对于效率损失以及成本变化的敏感性要弱一些,尤其是当决策者类型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下的利益相关者时。根据确定性条件下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数据,我们所估计的差异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也说明被试再分配决策中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权衡现象。

除此之外,被试的个人背景因素也影响了他们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选择。实验数据显示,来自农村、非独生的被试再分配偏好比来自城市、独生的被试高,政治倾向越保守的人再分配倾向越高。不过,与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不一致的是,他们研究发现禀赋获取方式公平分配决策中在男女性别上没有差异,可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不平等收入的获取方式对于再分配税率选择的影响大部分来源于男性,综合三部分数据,男性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比在测试法和游戏法下高出47.73%,而女性仅高出27.25%。这个研究结论上的差异可能是来自自然实地实验与实验室实验方法上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检验。

本文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结果,对于搭建宏微观之间的联系、为宏观规律寻找微观基础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弄明白一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的因素对于政策设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由于本实验室实验的被试主要来自中国

东部发达省份,经济较为开放且政治倾向较为自由(Pan and Xu, 2015),因此,存在低估被试再分配倾向的可能性。另外,根据 Levitt 和 List(2007)的研究,他们认为,实验室实验在被试的选择、实验背景、选择集合、时间约束等等方面受到限制,这会高估被试的公平偏好。我们认为本文还需要通过自然田野实验研究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作者单位:汪良军,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童波,中共桐庐县委党校;责任编辑:孟杰)

参考文献

- (1) Adams, 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pp.267~299.
- (2) Anderson, C. Putterman, L., 2006, "Do Non-strategic Sanctions Obey the Law of Demand?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in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54, pp.1~24.
- (3) Alesina, A. Angeletos, G.-M., 2005,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U.S. Versus Euro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4), pp. 960~980.
- (4) Alesina, A., Fuchs-Schündeln, N., 2007, "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pp.1507~1528.
- (5) Amiel, Yoram, Frank A. Cowell and Wulf Gaertner, 2009, "To Be or Not to be Involved: A Questionnaire-Experimental View on Harsanyi's Utilitarian Ethics",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32(2), pp.299~316.
- (6) Andreoni, J., Miller, J., 2002, "Giving According to GARP: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Consistency of Preferences For Altruism", *Econometrica*, 70, pp.737~753.
- (7) Andreoni, James and John H. Miller, 2008, "Analyzing Choice with Revealed Preference: Is Altruism Rational?",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1 pp.481~487.
- (8) Browning, E. K. & Johnson, W. R., 1984, "The Trade-Off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2), pp.175~203.
- (9) 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 & Meng, X., 2013, "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cience*, 339(6122), pp. 953~957.
- (10) Cappelen, Alexander W., Astri Drange Hole, Eriko. Sorensen and Bertil Tungodden, 2007, "The Pluralism of Fairness Ideal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3), pp.818~827.
- (11) Cappelen, Alexander W., James Konow, Eriko. Sorensen and Bertil Tungodden., 2013, "Just Luck: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Risk Taking and Fair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4), pp. 1398~1413.
- (12) Cappelen, A. W., Eichele, T., Hugaahl, K., Specht, K., Sørensen, E. Ø. & Tungodden, B., 2014, "Equity Theory and Fair Inequality: A Neuroeconomic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43), pp.15368~15372.
- (13) Carlsson, F., He, H. & Martinsson, P., 2013, "Easy Come, Easy Go",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6(2), pp.190~207.
- (14) Carpenter, J. P., 2007,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2, pp. 522~542.
- (15) Charness, G., Rabin, M., 2002, "Understanding Social Preferences with Simple Tes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pp. 817~869.
- (16) Cherry, T. L. and Shogren, J. F., 2008, "Self-Interest, Sympathy and the Origin of Endowments", *Economics Letters*, 101 (1), pp.69~72.
- (17) Chen, Yuyu, Hui Wang and David Y. Yang, 2016, "Salience of Histor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Available at SSRN 2717651.
- (18) Chen, Yuyu and David Y. Yang, 2015, "Historical Traumas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al Distrust: Political Inference from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Working Paper.
- (19) Cherry, Todd L., Peter Frykblom and Jason F. Shogren, 2002, "Hardnose the Dictat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4), pp.1218~1221.
- (20) Cherry, T., Kroll, S. & Shogren, J., 2005, "The Impact of Endowment Heterogeneity and Origin on Public Good Con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Lab",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7, pp.357~365.
- (21) Clark, J., 2002, "House Money Effects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5, pp.223~231.
- (22) Comeo, G., Grüner, H. P., 2002, "Individual Preferences for Political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 pp.83~107.
- (23) Durante, Ruben, Louis Putterman, Joel van der Weele, 2014,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nd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4), pp. 1059~1086.
- (24) Dworkin, R., 1981a, "What is Equality? Part 1. Equality of Welfar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0, pp.185~246.
- (25) Dworkin, R., 1981b, "What is Equality? Part 2.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0, pp.283~345.
- (26) Elaine M. Liu, Juanjuan Meng and Joseph Tao-yi Wang., 2014, "Confucianism and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4(2), pp.106~122.
- (27) Engelmann, D., Strobel, A., 2004, "Inequality Aversion, Efficiency and Maximin Preferences in Simple Distribution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4), pp.857~869.
- (28) Farina, Francesco, Gianluca Grimalda and Ulrich Schmidt, 2015, "A Cross-Country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mimeo,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Kiel University.
- (29) Faravelli, M., 2007, "How Context Matters: A Survey Based Experiment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7), pp.1399~1422.
- (30) Ferrer-i-Carbonell, Ada and Xavier Ramos.2010, "Inequality Aversion and Risk Attitudes", Working Paper.
- (31) Fehr, E., Schmidt, K.,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pp.817~868.
- (32) Fehr, E., Naef, M., Schmidt, K., 2006, "The Role of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Social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5), pp.1912~1917.
- (33) Fong, C., 2001, "Social Preferences, Self-Interest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22, pp.225~246.
- (34) Fershtman, Chaim, Uri Gneezy and John A. List, 2012, "Equity Aversion: Social Norms and the Desire to be Ahead",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44, pp. 131~144.

- (35) Frohlich, Norman, Joe A. Oppenheimer and Cheryl L. Eavey, 1987, "Laboratory Results on Rawls's Distributive Justi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1), pp. 1-21.
- (36) Giuliano, Paola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2014, "Growing Up in a Recess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2), pp. 787-817.
- (37) Gneezy, A., Gneezy, U., Nelson, L. D. & Brown, A., 2010, "Shar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Field Experiment in Pay-What-You-Want Pric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Science*, 329(5989), pp.325-327.
- (38) Harrison, G., 2007, "House Money Effects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Comment",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0, pp.429-437.
- (39) Hong, Hao, Jianfeng Ding and Yang Yao, 2015, "Individual Social Welfare Preferenc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57, pp. 89-97.
- (40) Horowitz, D. L., 1993,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4(4), pp. 18-38.
- (41) Kohler, S., 2003, "Difference Aversion and Surplus Concern—An Integrated Approach",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Working Paper.
- (42) Konow, J., 1996, "A Positive Theory of Economic Fair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1(1), pp.13-35.
- (43) Konow, James, 2000, "Fair Shares: Accountability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Allocation Deci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pp.1072-1091.
- (44) Konow, J., 2009, "Is Fairnes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An Impartial Spectator Analysis of Justice",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33(1), pp.101-127.
- (45) Krawczyk, Michal, 2010, "A Glimpse through the Veil of Ignoranc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1-2), pp.131-141.
- (46) Kroll, S., Cherry, T. & Shogren, J., 2007, "The Impact of Endowment Heterogeneity and Origin on Contributions In Best-shot Public Good Game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0, pp.411-428.
- (47) Levitt, S. & List, J., 2007, "What d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Measuring Social Preferences Reveal about the Real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pp.153-174.
- (48) List, J., 2007,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iving in Dictator Ga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 pp.482-493.
- (49) Mads M. Jager, 2006, "Welfare Regimes and Attitudes toward Redistribution: The Regime Hypothesis Revisite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2), pp.157-170.
- (50)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1), pp.914-27.
- (51) Mirrlees, James., 1971,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come Tax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8, pp. 175-208.
- (52) Nunn, Nathan, 2012,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27(S1), pp. S108-S126.
- (53) Nunn, Natha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pp.3221-3252.
- (54) Okun, A. M.,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55) Oxoby, R. J. & Spraggon, J., 2008, "Mine and Yours: Property Rights in Dictator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5, pp.703-713.
- (56) Piketty, T., 1995, "Soc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pp.551-584.
- (57) Pan, Jennifer and Yiqing Xu., 2015,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Working Paper*, pp.1-59.
- (58) Ravallion, Martin and Michael Lokshin, 2000, "Who Wants to Redistribute? The Tunnel Effect in 1990s Russi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1), pp. 87-104.
- (59) Roemer, J. E., 2002, "Egalitarianism Against the Veil of Ignoran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99(4), pp.167-184.
- (60) Romer, T., 1975, "Individual Welfare, Majority Voting and the Properties of a Linear Income Tax",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2), pp.163-185.
- (61) Roth, C., Wohlfart, J., 2016, "Experienced Inequa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Browser Download This Paper.
- (62)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 (63) Schildberg-Horisch, H., 2010, "Is the Veil of Ignorance only a Concept about Risk? An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12), pp.1062-1066.
- (64) Stefan Svallfors, 1997, "Worlds of Welfare and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A Comparison of Eight Western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3), pp.283-304.
- (65) Traub, S., Seidl, C. & Schmidt, U., 200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Individual Choice,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Preferen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3(4), pp.385-400.
- (66) Traub, S., Seidl, C., Schmidt, U. & Levati, M. V., 2005, "Friedman, Harsanyi, Rawls, Boulding—or Somebody Else?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4(2), pp.283-309.
- (67) Varian, H. R., 1980,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s Social Insur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4(1), pp.49-68.
- (68) 陈宗胜、李清彬:《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及经验验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 (69) 陈春良、易君健:《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 (70) 陈叶烽、周业安、宋紫峰:《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
- (71) 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
- (72) 丁建斌:《无知之幕下的社会福利判断——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
- (73) 何浩然、陈叶烽:《禀赋获得方式影响被试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来自自然现场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2012年第4期。
- (74) 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 (75) 潘春阳、何立新:《个人利益、分配公平与再分配平衡——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
- (76)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10期。
- (77) 吴一平、芮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0期。
- (78) 徐建斌:《收入水平、社会流动与再分配偏好——对“POUM”假说的再检验》,《南方经济》,2015年第11期。
- (79) 杨晓兰、周业安:《政府效率、社会选择和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被试的实验经济研究》,工作论文,2013年。
- (80) 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具有社会偏好个体的风险厌恶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